

重复博弈、复合竞争 与中印边界的互动态势

曹鹏鹏* 冯怀信**

【内容提要】 中印边界争端问题并非纯粹的领土主张，而是掺杂着多重现实性因素。重复博弈理论认为，边界争端因存在长期利益导向与“一报还一报”的理性报复策略，最终将走向一种可预期的稳定合作。重复博弈理论大致解释了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后，两国冲突烈度持续降低的基本逻辑。然而，近年来中印在边界区域的争端频率和烈度有所上升，尤其是2020年中印在加勒万河谷地带发生流血冲突后一段时间，双方保持着紧张对峙的态势。本文研究发现，中印受地位竞争、地缘空间竞争和与美国互动的复合竞争影响，导致印度产生本体性不安全。印度需要增加在边界问题上对中国的威慑力度，以消解其在边界对峙中的被动地位。

【关键词】 重复博弈 边界争端 复合竞争 本体性不安全
中印边界

DOI: 10.16608/j.cnki.nyyj.2022.02.04

中印是影响亚洲地区和平与稳定、繁荣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以及互动关系已经超出了双边关系范畴。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两国曾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合作的议题下有过“甜蜜岁月”，但西藏问题与1962年的边界战争使中印双边关系跌至冰点。边界问题也成为阻碍中印两国深化合作与交流的主要问题之一。尽管两国在边界问题上长期存在纠纷，但在此之后基本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边界互动态势，双边关系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也逐渐缓和并不断发展。

*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 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新疆大学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

然而,近年来中印两国的边界问题争端的频率和烈度均趋于升高,尤其是2017年洞朗对峙事件与2020年加勒万河谷事件,严重限制双边关系回归正常。加勒万河谷事件后,印度不仅在贸易、投资、市场准入等层面推出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企图在经贸层面“去中国化”,单方面强行和中国经济“脱钩”,更是在边界问题谈判上充斥机会主义心态,单方面维持与中国长时间的紧张对峙状态,导致中印关系持续恶化。本文尝试运用重复博弈与复合竞争理论回答印度出现这一行为背后的原因。研究发现:自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后,两国遵循长期利益导向与“一报还一报”的理性报复策略,使得冲突烈度基本平稳可控。而近年来中印存在的复合竞争使印度产生一种本体性不安全,导致印度单方面在边界问题上增加对华威慑力度。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本章将主要讨论国内外学界对中印边界互动的相关认识与研究,并以此构建文章的理论框架。

(一) 关于中印边界互动的文献综述

既有关于中印边界互动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调错误认知因素在中印边界互动中的影响作用。在国际危机处理中,决策者由于存在各种不可避免的主客观认知局限而产生错误认知,并以此夸大对手的威胁,制造恐惧与不信任。错误认知论将决策者个体因素作为冲突发生的突破口,比如对尼赫鲁1959~1962年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态度、观点等微观心理研究发现,决策者在危机处理过程中的错误知觉导致战争行为。^①当然,印度想象中单边默契、缺乏和平诚意造成双方的虚假共识也是导致中印边界争端走向战争局面的重要因素。^②近年来,有观点认为中印双方对各自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认知偏差,印度政府和领导人倾向于从进攻性角度看待中方的正当行为,对中方防御性的行为存在评估偏差;同样,中国从防御性角度也错误地评估印度的行为,使得印度单

^① Yaacov Vertzberger, "India's Strategic Posture and the Border War Defeat of 1962: A Case Study in Miscalculation,"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5, No. 3, 1982, pp. 370-392.

^② 尹继武:《单边默契、权力非对称与中印边界战争的起源》,《当代亚太》,2016年第5期,第33~65页。

重复博弈、复合竞争与中印边界的互动态势

方面发起洞朗对峙危机。^① 总之，中印相互之间的错误认知是导致双方边界存在不断争端的重要原因，然而错误认知一定会导致国家间冲突吗？错误认知是否与争端有直接的线性关系，依然遭到部分学者的质疑。^②

二是强调国内政治因素在边界互动中的作用。边界问题的危机决策不仅关乎决策者个人因素，也受到国内官僚政治、公众舆论和民族主义等国内政治压力影响。有观点指出，印度安全分析家、外交机构以及军队，中国的中央领导人、军队以及日益发展的安全团体，都寻求影响对方的政策，国内政治有潜力推动双边关系走向更趋于冲突的方向。^③ 印度国内左翼和右翼政党时常在议会中进行激烈斗争，一些政治反对派也会因为政治理念不合或者拉拢选民等考量而抨击现有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软弱态度，要求“采取坚定的不妥协的立场”。^④ 还有观点认为，印度边界问题是国内政治矛盾转移的“试验田”，印度的国内政治因素不但能够拖延和否决领土协议的实施，还可以影响中央政府与外国进行相关谈判时的动力与立场。印度国内政治给领土问题的解决造成的障碍会降低印度中央政府与外国解决领土问题的积极性。^⑤ 比如 1987 年印度方面在边境地区进行挑衅的原因就是拉吉夫·甘地政府受国内政治因素影响，有意加剧边境危机以转移国内矛盾、巩固政权而挑起的。^⑥ 而莫迪第二任期以来奉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宣布建立罗摩庙、修改公民身份法案等激化了国内各种矛盾，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后，经济遭受打击、失业人口增多，社会进一步动荡，直接侵蚀着莫迪政府的执政根基，促使其在加勒万河谷挑起中印边界纠纷，达到转移民众注意力和稀释民众对政府不满情绪的目的。^⑦ 此外，印度国民志愿服务

① 谢超：《洞朗对峙中的错误认知与危机缓和》，《国际政治科学》，2020 年第 1 期，第 61~89 页。

② 齐尚才：《错误知觉、议题身份与国际冲突——以中美南海航行自由争议为例》，《外交评论》，2017 年第 5 期，第 53~78 页。

③ David Malon and Rohan Mukherjee, “India and China: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Survival*, Vol. 52, No. 1, March 2010, pp. 137-158; 邓红英：《印度学界对中印边界谈判的看法与主张》，《南亚研究》，2014 年第 4 期，第 16~31 页。

④ 邱美荣：《危机外交中的国内政治因素——以中印危机（1959~1962）为例》，《国际观察》，2007 年第 4 期，第 26~33 页。

⑤ 许娟：《宗教政治化：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再次兴起及其对印度外交的影响》，《南亚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1~31 页。

⑥ 姬文波：《1987 年中印边界危机回顾与反思》，《南亚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68~91 页。

⑦ 童宇韬：《印度国内政治行为体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作用——以印孟陆地边界争端为例》，《南亚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60~89 页。

团 (RSS) 在中印领土纠纷上也一直持顽固立场, 2017 年中印“洞朗对峙”期间, RSS 煽风点火、推波助澜, 为中印解决边界纠纷制造障碍。^① 总之, 中国和印度是正在崛起的大国, 尤其是两国民族主义的兴起, 更加剧了两国本身在诸多问题上的安全困境, 可能在双方处理边界问题和更广泛利益冲突的方式中发挥影响。^②

三是强调威慑理论在中印边境冲突研究中的作用。^③ 比如一些观点从中国的角度出发, 对 1962 年中印边界战争进行研究, 认为中国对印度的领土野心释放了较为模糊的威慑信号, 即中国没有采取有效的强制措施, 导致印度认为中方不会以武力应对, 因此, 判定中国模糊威慑外交是失败的, 最终只能选择武力反击。^④ 也有观点从印度的角度出发, 认为长期以来, 中印之间存在着一种想象的安全困境, 而这种安全困境是印度秉持现实主义传统、固守传统地缘政治思维而想象生成的, 导致印度对华政策取向中的竞争性突出。^⑤ 中印两军作为想象的安全困境的最直接接受群体, 印度军方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对印发起无预警进攻的能力, 坚持对华实行拒止性威慑战略将让自己处于全面被动地位, 印度对华应该从拒止威慑转变为惩罚威慑, 边界争端就是对华惩罚性威慑的具体实践。^⑥

四是探究中印边界纠纷的博弈过程及结果。这一类研究大致以非合作博弈模型探究了中印边界争端博弈互动所呈现的状态、管控措施或某种机

① 许娟:《宗教政治化: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再次兴起及其对印度外交的影响》,第1~31页。

② Srinath Raghavan,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India-China Relations,” *Asian Security*, Vol. 15, No. 1, 2019, pp. 60-72.

③ Allen S. Whiting, “China’s Use of Force, 1950-96,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2, 2001, pp. 103-131; Mark Burles and Abram N. Shulsky, *Patterns in China’s Use of Force: Evidence from History and Doctrinal Writing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0), pp. 8-10; 谢超:《从洞朗到拉达克:印度对华威慑战略为何失败》,《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8期,第34~54页。

④ Allen S. Whiting, “China’s Use of Force, 1950-96, and Taiwan,” pp. 103-131.

⑤ 朱翠萍、[美]科林·弗林特:《“安全困境”与印度对华战略逻辑》,《当代亚太》,2019年第6期,第26~46页。

⑥ 谢超:《从洞朗到拉达克:印度对华威慑战略为何失败》,第42~43页; Srinath Raghavan,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India-China Relations,” pp. 60-72; Jonathan Holslag, “The Persistent Military Security Dilemma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2, No. 6, 2009, pp. 103-131; Yogesh Joshi and Anit Mukherjee, “From Denial to Punishment: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Changes in India’s Military Strategy towards China,” *Asian Security*, Vol. 15, No. 1, 2019, pp. 25-43.

重复博弈、复合竞争与中印边界的互动态势

制在中印边境地区双边博弈中所扮演的角色,^①或是以动态博弈的研究方法,将边界问题缩放至崛起国面对的战略方向目标以讨论在边界争端的博弈问题。^②

综上所述,对于中印领土争端进行多角度研究的论文较多,主要考察中印为什么在边界问题上持续发生争端以及边界问题对中印双边关系的影响。上述看法体现了边界纠纷的存在对于中印关系的良性发展起着一种长周期且不断重复的影响。由于近年来中国和印度的不对称崛起,两国的竞争已经超越了地区层面。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边界纠纷不单单是主权领土问题,国家间竞争、与第三国关系竞争都会对边界问题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引入重复博弈与复合竞争理论,着重解释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后双方冲突烈度趋于降低,然而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中印两国的前线部队却依旧维持较长时间的紧张对峙这一现象。

(二) 理论解释框架

重复博弈理论认为,第一次中印边界争端会走向战争,在长期边界争端博弈中,中印则会倾向于减小冲突烈度。重复博弈导出合作是基于完全理性人的假设,其基本要素包括:(1)参与个体(players),即在与他人博弈过程中可以选择行为策略的行为体,即中印作为参与者,遵循“理性选择”假设,其目的是在博弈过程中通过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收益。具体表现为:两国在博弈的过程中都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两国会基于理性而选择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2)策略(strategies),即行为体在博弈过程中每个时刻可能选择的行为表现。(3)行为(actions),即行为体在一次互动中所有可能做出的选择。(4)收益(pay off),即参与个体在特定的策略空间下最终得到的总效用。

从一次博弈和重复博弈的对比发现,在一次博弈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一方难以确定对方的真实意图,加之国内舆论的干扰和领土问题的不可分割性,造成在一次博弈中双方往往会陷入“囚徒困境”局面。然而,在多次重复博弈中,随着博弈次数的增多,往往会促成博弈参与者倾向于默契合作的策略。主要原因第一是长期利益的导向。对博弈轮数的期望值

^① 随新民:《中印边境互动:一种博弈视角的分析》,《南亚研究》,2014年第4期,第1~15页。

^② 叶海林:《自我认知、关系认知与策略互动——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博弈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第4~23页;叶海林:《中国崛起与次要战略方向挑战的应对——以洞朗事件后的中印关系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4期,第106~128页。

影响到行为体的决定，当行为体看到合作的未来收益会比当前选择背叛的收益更大，就越有可能合作。第二是重复博弈中的“一报还一报”策略导致合作。“一报还一报”策略从字面意思上解释是指行为体的策略选择是基于上一次策略或者对方策略的一种反应。即一方与之合作，我方则合作，一方与之对抗，我方则对抗；这个策略构成一个纳什均衡。它是规避自身损失、惩罚对手背叛和保持下一阶段与博弈者合作的必要选择。阿克塞尔罗德认为，“一报还一报”由于其善良性、可激怒性、宽容性和清晰性，而具有鼓励合作的优点。^① 第三是声誉成本的重视。在重复博弈中，参与者的行为决定其在未来与不同国家交往之中的声誉问题，因此声誉就成为判断国家未来行为选择的重要依据，良好的声誉能够为国家换取未来更多的合作机遇，而不良的声誉则会使国家陷入孤立状态。如果一方合作，而另一方背叛，对于国家声誉的损失将会更大。第四是信息不对称的克服。“囚徒困境”博弈状态下存在信息沟通障碍，容易导致战略误区，但是在重复博弈中，双方相互之间不断了解与试探，合作承诺就存在信息通道，即信息越明确，合作越有可能。本文需要探讨在从“零和博弈”走向合作博弈中，理性的国家行为体通过持续重复的博弈会逐步认识到，只要在互动中保持及时、可信以及有力的“一报还一报”策略，国家就会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而在博弈中采取合作行为。

中印边界纠纷并非属于纯粹的领土主张，复合竞争理论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外部性因素提供了客观解释。长期以来，印度都将中国视作全方位的“假想敌”和最主要的外部战略挑战者。^② 中印竞争也远非纯粹的双边竞争，符合一种“复合竞争”（Complex Rivalry）关系。学界对复合竞争的研究基本表现为：一是需与竞争方的其他伙伴或竞争对手的互动。比如印巴竞争、中美竞争、中日竞争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Non-linear Interactions）给中印关系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③ 或应该多于两个行为体间的竞争关系，

① [美]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吴坚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

② Tanvi Madan, “Not Your Mother’s Cold War: India’s Options in US-China Competi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3, No. 4, 2020, pp. 41-62.

③ Manjeet S. Pardesi, “Explaining the Asymmetry in the Sino-Indian Strategic Rivalr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5, No. 3, 2021, pp. 341-365.

重复博弈、复合竞争与中印边界的互动态势

且这些行为体间的关系具有利益交织、结盟或冲突等特征。^① 二是复合竞争既受到第三方因素影响，也受到“权力+理念”效应叠加的复合竞争模式影响。^② 本文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将中印存在复合竞争定义为同时表现出了地缘空间竞争、地位竞争和与美国互动竞争，复合竞争成为推动中印在边界持续对峙和难以脱离接触的客观现实因素。

表 1 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理论解释框架

现象 分析视角	1962 年中印边界战争后 边界冲突烈度降低	2020 年中印在加勒万河谷冲突后 两军依旧保持较长时间的紧张接触态势
重复博弈理论	可解释	未能解释
复合竞争理论	未能解释	可解释

注：笔者自制。

二、从“战争”到“争端”：中印边界的重复博弈

本节主要通过通过对中印在 1962 年发生的战争事件梳理，将历史回顾与博弈论模型相结合，构建出中印在边界争端问题上的“一次博弈”模型，并梳理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具体博弈策略。

（一）1962 年中印边界战争分析：一次“零和博弈”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中印因“西藏问题”和边界问题而展开密集外交照会，进行首轮博弈。这一阶段印度奉行“前进政策”，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制造了朗久、空喀山口事件。中国则极力克制，严格遵守暂时维持现状、通过谈判协商解决的方针以避免事态恶化。同时，中国也据理力争，驳斥“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由于在一次博弈中，行为体对博弈策略的选择遵从理性人假设，对相对收益的敏感程度导致双方难以选择妥协。即边界问题关乎国家荣誉和民族尊严，危机越趋于升高，风险接受意愿就越发强烈。具体博弈策略如下（见表 2）。

^① Elina Sinkkonen, “The More the Merrier? Sino-Japanese Security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Complex Interstate Rivalr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2, No. 5, 2019, pp. 748-777.

^② 徐进：《理念竞争、秩序构建与权力转移》，《当代亚太》，2019 年第 4 期，第 9 页。

表2 中印边界争端走向战争的一次博弈结构

	印方		
中方		主动克制	主动对抗
	主动克制	(A, A)	(C, D)
	主动对抗	(D, C)	(B, B)

注：笔者自制。

假设1：若中印双方均在一次博弈中选择“主动克制”，双方各得收益赋值为“A”。

假设2：若中印双方均在一次博弈中选择“主动对抗”，双方各得收益赋值为“B”。

假设3：若双方选取不同策略时：首先印度选择“主动对抗”，中国不迎合印度的策略，而依然保持与印度的“主动克制”，那么印度和中国的收益依次赋值(D, C)，也就是选择主动克制的一方会获得收益为C，而选择对抗的一方会获得收益为D。根据四种博弈类型的收益可得，双方均出现“主动克制”的收益情况大于一方“主动克制”、另一方选择“主动对抗”的收益以及双方均呈现“主动对抗”的收益，且双方收益之和满足 $(A+A) > (C+D)$ ， $(A+A) > (B+B)$ ，这是一次博弈的理想状态。现实中的一次博弈，每一方在并不知道对方选择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选择。但无论对方选择什么，选择战争总会比选择对峙有着较高的收益。中印双方在面对信息沟通有限的情况下，国家追求必须确保安全最大化，因此，一次性博弈使得中印双方陷入了“零和困境”，即双方都会倾向于选择“主动对抗”策略。在整个博弈的过程中，依次涉及界定利益、讨价还价、国内舆论压力、信息沟通的不对称等环节造成中印双方的边界战争。

第一是界定利益。印度在独立之后，完全继承了英国的传统地缘安全思维，将中国的西藏地区作为印度北部的“战略缓冲地带”，并且在英国撤出西藏后完全占有英国在西藏地区的权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前，印度千方百计设法阻挠西藏的和平解放，印度政府还向藏军提供武器装备、无线电技术以及为其训练士兵等军事援助。^① 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印度只能被迫签署《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放弃在藏特权并承认西藏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尼赫鲁政府

^① 韩敬云、王伟：《印度涉藏政策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取向》，《南亚研究》，2020年第2期，第70页。

重复博弈、复合竞争与中印边界的互动态势

并未死心，而是将目光转移到中印边界问题上，坚称“麦克马洪线”不存在争议，妄图不明不白占有中国在该地区的固有领土。1950年11月20日，尼赫鲁在印度议会人民院谈到东段边界时称：“我们的地图表明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那就是我们的边界——不管地图不地图。这个事实没有改变。我们坚持这条边界，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①

中国基于自身的核心利益主要有两点主张。其一，西藏问题是中国国内政治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核心问题。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并被印度官方收容。3月30日，时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在住宅接见了以西藏叛乱分子鲁康娃为首的代表团，并在随后的印度议会外交咨询委员会上发表错误评论。^②这引发了中国国内的极大愤慨。西藏叛乱发生后，毛泽东在修改《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时加写了一段话：“现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份不光彩的遗产。”^③显然，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已经将印度与西藏叛乱联系在一起。其二，新中国致力于破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留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所谓“麦克马洪线”问题始于英帝国对中国西藏地区的非法侵略，意图把包括滇缅未定界在内的大片地区划给英属印度。历届中国政府并未承认过“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希望重新商定边界、和平合理地解决领土争议问题。

第二是讨价还价。博弈论中的讨价还价必然是双方在利益界定的基础上完成的，讨价还价中任何一方的效用增加，即意味着另一方的效用减少。在一次博弈中，中印两军曾于1954年夏在中国领土乌热发生首次对峙，但中方为维护两国友谊采取了克制态度。^④随后，由于双方的持续互动产生的舆论压力，国内接受风险的意愿也逐步增强，达成主动克制的意愿均不明显，往往出现零和竞局。例如，1958年下半年，中印边界出现剑拔弩张态势，双边关系趋向恶化。尼赫鲁在1958年12月14日给周恩来的一封长信

① 孟庆龙：《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态度的变化》，《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53页。

② 《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再谈我国西藏局势 并在住宅接见了以西藏叛乱分子鲁康娃为首的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59年4月3日，第4版；《在印度议会外交咨询委员会上 尼赫鲁谈西藏叛乱事件》，载《人民日报》，1959年4月14日，第4版。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④ 孟庆龙：《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态度的变化》，第54页。

中说,“印度的印象是两国之间不存在边界争端,印度的这些‘大片土地’只能是属于印度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对这些土地不存在争端。”^①周恩来总理则于1959年9月8日致函尼赫鲁,就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方针做了全面的申述。在此以后,中国政府收到尼赫鲁总理的来信,印度政府表示不能同意周恩来总理对边界事实的申述。中国方面则希望以合作的方式进行会谈,并提议周恩来和尼赫鲁进行当面谈。^②1959年11月7日,周恩来再次致函尼赫鲁,提出在东段和西段的双方实控线各自后撤20公里、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及友好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点建议。但尼赫鲁执意坚持东西段争议地区根据历史、习惯或者协定属于印度的组成部分。^③

1960年2月29日,周恩来接受尼赫鲁赴新德里会谈的邀请。印度却在会谈前夕出版的印度北部边界地图中依旧将“麦克马洪线”标为中印之间的已定界,不但没有为即将举行的两国总理会晤营造气氛,反而摆出一副强硬姿态。^④中印两国总理在新德里会谈后,尼赫鲁于4月29日在印度议会人民院和联邦院辩论中依旧继续使用中国“侵略”印度领土的言辞。^⑤印度国内一些政客和媒体也开始调转语调攻击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诬蔑中国“入侵”印度边界。^⑥周恩来随后致电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建议西藏和南疆军区应该抓紧目前时机和气候条件,在我国边境线上比如在数公里以内控制有利地形,先机增设哨所。毛泽东批:“照办。”^⑦显然,在整个讨价还价过程中,双方给出的条件均没有达到对方心里满意的“价位”,且这一时期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日盛,充分暴露了印度无意愿和平谈判的真实意图。

① 《尼赫鲁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1958年12月14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和印度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来往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以下简称《文件汇编》),1960年,第175页。转引自孟庆龙:《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态度的变化》,第54页。

② 《印度总理尼赫鲁1959年12月21日就中印边界问题给周恩来总理的信》,载《人民日报》,1960年1月3日,第2版。

③ 同上注。

④ 孟庆龙:《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态度的变化》,第57页。

⑤ 《在印度人民院和联邦院辩论时 尼赫鲁竟继续诬蔑中国“侵略”》,载《人民日报》,1960年5月2日,第3版。

⑥ 《印度国大党主席雷迪又诬蔑我国“侵略”》,载《人民日报》,1960年5月22日,第5版。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15~316页。

重复博弈、复合竞争与中印边界的互动态势

第三是国内舆论压力。印度国内民族主义者一直认为西藏文化是印度文化的一部分，西藏最富饶的农业生产区雅鲁藏布江上游的河谷和南亚的恒河平原之间一直存在着经济互动，使得西藏与印度比西藏与中国内地的经济交流频繁得多。^① 印方还炮制“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的整个理论是一种帝国主义学说”^②。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1959年平定西藏叛乱，引发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者煽动反华反共高潮。自1959年2月底到4月初的一个多月内，印度36家报纸就发表了三百多篇文章和约31万字的新闻，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印度人民党、国大党右派潘特、德赛等甚至组织反华游行，支持所谓的“西藏独立”，严重干涉中国内政。^③ 1961年，印度当局连续不断地对华侨进行迫害并对华侨采取押解出境等一系列歧视性做法，引起中方严重关切。而中印边界发生的几起冲突事件也导致双方矛盾呈现出不可调和的特征，尤其是印度士兵在边境的死亡激起了印度的公众舆论并给政府带来相当大的压力。尼赫鲁政府开始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发声，舆论宣传成为其外交博弈的工具，呈现出与中国强硬对抗的姿态。在1959年9月初的一次国会讲话中，尼赫鲁突然宣布将公开过去五年来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来往文件，并以政府白皮书的形式定期向公众发布有关进展情况。^④ 这激起了印度国内媒体和反对派对信息的过度揣测，使尼赫鲁政府面临强大的国内舆论压力。当时尼赫鲁的决策圈普遍认为，对中国的边界争端没有回旋余地，也反对采取温和的外交政策。

第四是信息沟通的不对称。一次博弈中，博弈双方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双方在不了解对方真实意图的前提下，会倾向于隐藏真实意图，导致谈判合作的难度增加，产生信任危机。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前夕的整个谈判过程中，印度从开始就严重低估了中国捍卫领土完整和不容别国干涉内政的决心。一是出于对中印权力结构的错误认知，印度认为在当时特定的情境下，其对于中国具有政治、战略和军事等方面的优势，所以对于

① John Garver, "The Unresolved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An Interpretation," *China Report*, Vol. 47, No. 2, May 2011, pp. 99-113.

② 《印度人民同盟总书记竟用“热战的语言”公然叫嚣要派“志愿军”去西藏》，载《人民日报》，1959年4月30日，第5版。

③ 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页。

④ 谢超：《国内观众成本与印度国际危机谈判行为》，《外交评论》，2016年第6期，第117页。

来自中方的沟通、协商和威慑，印方均可以完全无视。^①二是，1961年至1962年夏期间，印度加速实施“前进政策”，希望获得战略要地进而升级与中国边防部队的紧张对峙，增加对中国边界领土的入侵挑衅。而深受其顾问（特别是情报局长穆立克）的影响，尼赫鲁深信中国不会因边界纠纷对印度使用武力，中国强烈的警告只是虚张声势。^②尤其1960年至1962年期间，中国面临着内部和外部诸多问题，国内经济形势受“大跃进”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停滞不前；外交上，从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公开争吵到1962年4月至5月发生的“伊塔事件”，苏联基本中断了对中国的物资援助和外交支持，而对印度提供了部分军事援助。^③同时，印度还得到美国7.2亿美元的资金援助。^④此时，一系列对印度有利的客观政治环境增强了尼赫鲁政府的军事冒险心态。

中国则将印度对西藏叛乱分子及达赖喇嘛的支持以及策划达赖喇嘛叛逃与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强硬政策联系起来。有研究指出，印度在边境上的积极姿态反映了其将西藏变成印度“殖民地或保护国”的愿望，印度国内持续已久的“反华”势力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和潜在挑战。^⑤总之，双方信息沟通的不对称成为中印边界争端走向战争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中印边界“重复博弈”与合作策略（1987~2020年）

重复博弈理论认为，假使双方在一次博弈中导向不合作，而在多次重复博弈中会更加倾向于合作博弈状态，这取决于双方的长期利益导向和“一报还一报”。

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苏争霸愈演愈烈，第三世界国家开始走向历史舞台。中国倡导团结第三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呼声在国际上得到有效回应。1970年，毛泽东主席曾经在天安门城楼上握着印度驻华临时代办巴拉杰什·米什拉的手说：“我们总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⑥1976年4月，受两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中印双方出现某种缓和的信号，

① 尹继武：《单边默契、权力非对称与中印边界战争的起源》，第40~43页。

② 随新民：《印度对中印边界的认知》，《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1期，第72页。

③ 戴超武：《关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和中苏分裂研究的若干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2010年第4期，第181页。

④ 《美国将继续给印度大量“援助” 参院外委会决定下年度“援”款仍达七亿多美元》，载《人民日报》，1962年5月28日，第3版。

⑤ Srinath Raghavan,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India-China Relations,” pp. 65-70.

⑥ 于洪君：《龙象共舞有望开启中印关系新时代——中印睦邻友好关系的形成与演变》，观察者网，2020年4月8日。https://www.guancha.cn/YuHongjun/2020_04_08_546026.shtml

重复博弈、复合竞争与中印边界的互动态势

先是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电贺华国锋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随后中国外长乔冠华与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先后会见了印度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科切里尔·拉曼·纳拉亚南（Kocheril Raman Narayanan）。^①加之，1977年3月16日，印度执政三十年的国大党在大选中惨败，人民党主席莫拉尔吉·德赛（Morarji Desai）当选为印度新政府总理，重申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和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外交。此后，中印关系开始逐步缓和与发展。1981年6月26日，中国外长黄华访问印度并会见印度外长纳拉辛哈·拉奥，双方一致同意在完全承认各国主权、平等和独立的情况下通过和平的双边谈判来解决那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边界谈判在中断近二十年后重新开始。^②但双方对边界问题的严重分歧导致谈判进程缓慢。

表3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后至加勒万河谷事件前的六次低烈度事件

时间	事件
1987年5月	桑多洛河谷冲突
1999年7月	持续82天的“东章对峙”
2008年6月	锡金段“指尖地区”对峙
2013年5月	西段的德普桑峡谷发生“帐篷对峙”事件
2014年9月	西段楚木惹地区发生军事对峙
2017年6~8月	锡金段洞朗地区对峙

注：笔者根据相关报道自制。

1983年夏季，印军派出情报小组渗透到“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桑多洛河谷地区进行侦察和试探。1986年2月，印度“鹰派”陆军参谋长K. 森德吉明确提出，一旦开战要把战争推向别国领土。^③1987年2月20日，印度当局宣布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正式成立，这为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和两国关系的改善增加了障碍。同年4月，印度自认为已居于“强有力的优势”地位，开始在印中边境增强军力部署，随即越过中印边界的实际控制线，并侵入中国桑多洛河谷地区的领土（旺东地区）和克节朗地区，印

① 《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电贺华国锋总理》，载《人民日报》，1976年4月14日，第6版；《乔冠华外长会见印度新任驻中国大使》，载《人民日报》，1976年7月11日，第2版；《谷牧副总理会见印度新任驻华大使》，载《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4日，第7版。

② 《印度外长举行宴会欢迎黄华外长 拉奥表示愿意着眼于未来改善两国关系解决现存问题 黄华认为只要双方具有诚意分歧总可解决关系总会发展》，载《人民日报》，1981年6月28日，第4版。

③ 姬文波：《1987年中印边界危机回顾与反思》，第70页。

度军队及战略空军基地进入戒备状态，其最大的前沿战略基地已奉命执行“监视和拦截任务”，并展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对中国进行挑衅。^①为遏制印军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和渗透，中国军队展开针锋相对的军事斗争，西藏边防部队进入旺东和克节朗河谷北岸设点驻防。这是自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事件。随后，由于中印对事态的冷静控制与双方领导人的理性克制，局势很快得到缓和。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两国外交正常化。双方开始致力于重建双边合作，妥善解决边界问题。桑多洛河谷边界冲突后，虽然双方在地区安全等问题上持不同意见和看法，但是总体来看，中印都是理性平和地处理双边关系，且双方均多次明确彼此互不构成威胁的基本定位。中印两国1993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6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和2005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中均明确承认相互同等安全原则。

2012年，为及时通报有关边界问题的信息，中印同意建立中印边界事务磋商与协调工作机制。2013年以来，中印边界争端进入了一个高峰期。印度国内媒体时常宣扬“中国入侵”论，严重地破坏了中印边界多年来维持的稳定与和平。2013年4月“帐篷对峙”事件持续了20多天，两国最终举行了地方指挥官的“国旗会议”并宣布缓解了这次危机。事件之后，印度总理辛格访华，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边防合作协议》，在位于实际控制范围内双方商定的地点以及军事总部均建立了电话联系等，以增进两国边防部队之间的了解与合作。显然，由于印度和中国建立了协定和自我约束机制，避免了局势升级，也显示了中国对印度的外交战略中始终秉承双方应寻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基本原则。^②2014年2月，竞选印度总理的莫迪在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发表竞选演说时

^① 《印度强行成立“阿鲁纳恰尔邦” 为合情合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设置新障碍》，载《人民日报》，1987年2月22日，第6版；《印度报纸和外国通讯社报道表明 印否认在中印边境集结军队违背事实》，载《人民日报》，1987年4月26日，第6版。

^② Mao Jikang and Li Mingjiang, “Between Engagement and Counter-hedging: China’s India Strategy,” *Maritime Affairs: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Maritime Foundation of India*, Vol. 15, No. 2, 2019, pp. 31-43.

重复博弈、复合竞争与中印边界的互动态势

称,“我以这片土地的名义发誓:我将捍卫我们的国家。”^① 这预示着莫迪执政后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莫迪当选后开始强烈支持印度在国防生产领域自力更生,显示出印度强大的军事野心。同年9月,中国领导人访问印度时,双方在西段楚木惹地区发生短暂的军事对峙。2015年9月,印度为控制中印边界西段的战略要地,在中印边界西段的列城成立了“印藏边境警察部队”新司令部,与负责边境防御的陆军司令部驻地相通以便于合作。^② 此外,印度在边界区域大规模部署装甲部队和山地打击部队,并采购大量国外先进武器装备,快速提高战略进攻能力。

2017年6月,两百余名印度边防军人携带武器进入中国境内阻挠中方正常的修路活动,造成洞朗对峙事件。面对印度主动挑起的争端,中国外交部多次强烈警告。其中,中国外交部8月2日发布的《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文件全面阐述了印军越界事件的事实真相和中国政府立场。^③ 洞朗危机后,双方显著增多的高层会晤对于中印关系回暖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2018年,习近平主席先后与莫迪总理在中国武汉、中国青岛、南非约翰内斯堡、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进行了多次会晤与坦诚交流,直接推动此前跌入冰点的双边关系解冻和回暖(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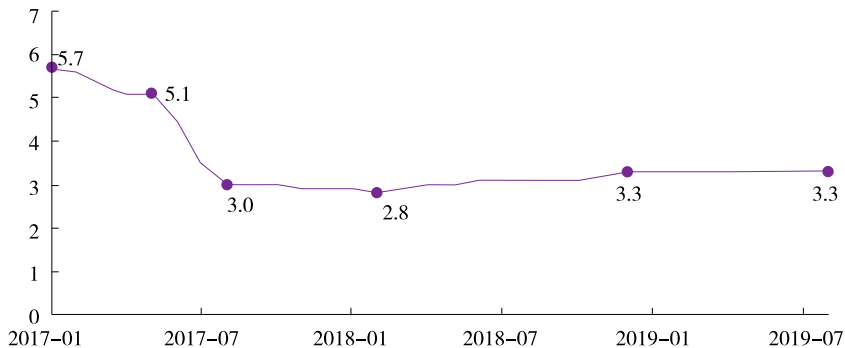


图1 2017年至2019年8月中印关系分线图

资料来源:谢超:《2020年中印关系将保持缓慢回暖趋势》,《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4期,第190页。

①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是印度旧政府的历史错误?》,澎湃新闻,2014年6月10日。
https://m.thepaper.cn/wifiKey_detail.jsp?contid=1250814&from=wifiKey#

② 张世均:《中印领土争端问题的危机管控机制》,《南亚研究季刊》,2017年第2期,第14页。

③ 《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全文)》,中国政府网,2017年8月2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7-08/02/content_5215586.htm

然而,2019年10月31日,印度政府以单方面修改国内宪法第370条的形式,取消此前宪法赋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位,设立了所谓的“查谟和克什米尔中央直辖区”和“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将部分中国领土划入印度行政管辖范围,遭到中国的反对。中国声明印度的单边行为是非法、无效的。同年12月21日,中印两国在新德里举行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二十二次会晤,双方就边界互信达成共识,同意制定管控规则,加强两国边防部队之间的沟通交流,并设立热线及增设会晤点等。^①2020年初始,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印度国民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秩序的稳定,莫迪政府政绩基础与国内政局面临诸多挑战。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得莫迪政府在边界问题上充满激进倾向。4月至5月上旬,印方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多次越线进入中国领土,蓄意挑起事端,试图单方面改变边境管控现状。6月15日,印度边界部队的挑衅行为最终酿成双方一线部队在加勒万河谷的肢体冲突。

总体而言,长期利益导向是双方维持边界稳定的基本前提,而“一报还一报”比较符合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策略偏好,2013年后,在国内、国际形势的推动下,印方采取行动,促使双方的博弈进入威慑升级状态。印度在边界决策上始终怀有一种机会主义心态,不断升级对中国的边界威慑策略,实行冒险主义军事和外交政策,寄希望于蚕食中国领土,以迫使中国在边界谈判上做出让步。在2017年洞朗危机和2020年加勒万河谷危机中,印度多次出尔反尔,破坏双方多层次会谈达成的共识,公然非法越线,造成边界局势紧张。而依据“一报还一报”策略,中国政府则进行了有理、有据、有节的反击,促使印度明确认识到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

三、复合竞争：印度本体性不安全与冒险行为

中印边界问题发展至今,已经超越单一的领土主权争端,在历史隔阂与文化积怨的基础上,伴随着地区性大国崛起与地缘政治利益诉求的影响,国家间多领域的复合竞争因素已经渗透进中印边界争端的互动态势中。因此,复合竞争是分析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单方面与中国保持紧张接触

^① 《中印举行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中国政府网,2019年12月22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19-12/22/content_5462999.htm

重复博弈、复合竞争与中印边界的互动态势

态势的客观视角。依据上文，中印复合竞争主要体现为两国的地位竞争、地缘空间竞争和与美国互动的竞争。

(一) 地位竞争

从地位竞争的视角来看，中印属于第一崛起国和第二崛起国的地位竞争关系。学者在解释地位竞争的影响时，认为地位是国家获得自尊的前提，也是国家不安全感的重要来源。^① 国家间相对地位接近权力体系顶峰所产生的矛盾导致地位主导的竞争行为。^②

根据美国军控与裁军署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1968 年公布的《1966~1967 年度世界军费支出报告》中中印边界战争结束四年后两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大致水平 (见表 5)，尽管印度有相对中国好得多的外交环境，能够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获得国际经济援助，但总体而言，中印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对比上并没有较大差距。

表 4 1966~1967 年度中印经济军事实力对比 (单位: 亿美元)

	GNP (国民生产 总值)	军费 支出总额	接受 国际援助	公共 教育支出	公共 健康支出	人口 (亿)	军队人数 (万人)	军人占总 人口比重 (%)
中国	800	65	0.8	28	10	7.72	250	0.3
印度	368.95	14	13	10	1.61	5	100	0.2

注: 按 20 世纪 60 年代美元汇率统计。

资料来源: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Report 1966-1967.” U. 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December 1968, pp. 8-12. <https://2009-2017.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85680.pdf>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从军事实力发展、经济模式优化到国际经贸秩序与发展理念的引领，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兴国家崛起的“领头羊”。从经济和军事实力来看，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远超印度 (见表 5)。从中印国际地位对比来看，2008~2018 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抵近美国，并在亚洲区域范围和东亚次区域范围占据相对优

^① Joshua Freedman, “Status Insecurity and Temporality in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2, No. 4, 2020, pp. 797-822; Marina G. Duque, “Recognizing International Status: A Relationa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2, No. 3, September 2018, pp. 577-592.

^② Elina Sinkkonen, “The More the Merrier? Sino-Japanese Security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Complex Interstate Rivalr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p. 748-777.

势地位，持续扩大对印度的优势（见表6）。

表5 中国和印度的GDP和军事支出（单位：十亿美元）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GDP	军事支出/ GDP (%)	GDP	军事支出/ GDP (%)	GDP	军事支出/ GDP (%)	GDP	军事支出/ GDP (%)
中国	360.858	2.49	1211	1.89	6087	1.91	14729.497	1.28
印度	320.979	3.15	468.395	2.95	1676	2.71	2621.124	2.13

数据来源：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军事支出数据来自SIPRI数据库。<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表6 2008~2018年中印国际地位指标比较

国家	年均国家战略资源变化	年均国际互动进程变化	年均国际地位变化
中国	4.06%	5.60%	4.40%
印度	2.33%	1.13%	2.11%

资料来源：门洪华、王骁：《中国国际地位动态研究（2008~2018）》，《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7期，第87页。

中国崛起带来中印在地区经济、军事与政治领域的优势差距显著扩大的同时，也导致印度产生了攀比、妒忌、焦虑与恐惧的复杂心态。一些学者认为，两国存在明显的物质力量和地位实力的差距，中印竞争存在非对称性，本质上是“单方面的竞争”（one-sided rivalry）或者中国有意地将印度定位为次要的竞争对手。^① 中印因为地位差距对彼此的关注不对称，使得印度存在天然的“弱者心态”。印度将中国崛起视为对其在南亚地区秩序中主导地位的冲击。2015年5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指出，中国海军的战略重点将逐步由“近海防御”转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相结合。^② 一些学者鼓吹中国通过军事基地、港口租赁和掠夺性经济大举“入侵”印度洋，这构成了对印度迫在眉睫的战略

① 关于这方面论述参见：Manjeet S. Pardesi, “Explaining the Asymmetry in the Sino-Indian Strategic Rivalr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5, No. 3, 2021, pp. 341-365; Susan Shirk, “One-Sided Rivalry: China’s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 toward India,” in Francine R. Frankel and Harry Harding eds., *The India-China Relationship: W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 to Kno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75-100; 叶海林：《中国崛起与次要战略方向挑战的应对——以洞朗事件后的中印关系为例》，第122~128页。

② 《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办公室，2015年5月26日。<http://www.scio.gov.cn/ztk/dtzt/2015/32868/32871/Document/1435054/1435054.htm>

挑战。^①另外，印度对“一带一路”持排斥态度的部分原因是印度渴望获得大国地位。有观点认为，印度的认知与反应是由其国家理想、外交传统以及中美印三国的相对地位和绝对地位决定的。印度质疑和反对加入“一带一路”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国没有解决印度的主要安全关切；二是对“一带一路”倡议本身的质疑。^②

因而，从2017年的洞朗对峙危机，到印度在加勒万河谷地带的一系列动作，主要目的是阻止中国的影响力继续在南亚地区及印度洋海域拓展，继而维护印度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二) 地缘空间竞争

在空间有限性的假定下，两个崛起国共同崛起必然面临处于有限空间的竞争表征。埃莉娜·辛科宁（Elina Sinkkonen）将复合性空间竞争定义为不同国家在同一片领土上产生排他性控制的意图导致空间主导的竞争行为，^③印度洋对于中印而言属于复合性空间竞争领域。中国至少80%的石油进口需要通过印度洋、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且印度90%的能源进口和贸易量也都要通过印度洋水域。^④印度认为印度洋的安全是其作为独立国家生存所必需的，基于自身的战略考量，印度对任何域外力量介入印度洋都存有明确的防备心态。2013年，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并同时在南亚分别建设两条经济走廊，即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落实与经济走廊的建立和运行使印度对中国在南亚及印度洋的存在高度警惕。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致力于加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中巴经济走廊”（CPEC）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多个走廊中的双边走廊，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象征。“中巴经济走廊”合作项目的稳固推进直接引发印度国内的焦虑心理，印度学者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污名

^① “Reshaping India-United States Defense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CSIS, August 23, 2018.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eshaping-india-united-states-defense-cooperation-indo-pacific>

^② 毛悦：《从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反应看印度外交思维模式》，《国际论坛》，2017年第1期，第38页；Mao Jikang and Li Mingjiang, “Between Engagement and Counter-hedging: China’s India Strategy,” pp. 31-43.

^③ Elina Sinkkonen, “The More the Merrier? Sino-Japanese Security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Complex Interstate Rivalr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p. 748-777.

^④ Gopal Suri, “India’s Maritime Security Concerns and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Indian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Vol. 11, No. 3, 2016, p. 247.

化,称其是中国介入印巴问题的“工具”。^①2017年3月,印度年度国防报告称,中巴经济走廊穿过巴基斯坦占领的克什米尔地区,侵犯了印度的领土主权,严重恶化印度的国家安全。^②印度学界还认为中国在该地区扩建和运营瓜德尔港、汉班托特港和实兑港是构成了对印度地缘空间的“战略围堵链”。^③2011年,印度政府成立了“纳雷什·钱德拉(Naresh Chandra)委员会”特别工作组对印度的国家安全环境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其中包括中国崛起带来的地缘空间挑战。^④也有研究指出,印度对中国在整个西藏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道路交通网的建设心存忧忌。^⑤莫迪政府上台后,面对中国在陆地边境和海上领域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开始积极在中印边界部署进攻性武器,军事制衡带有严重的针对性和敌意。印度对中国的军事战略也转变为“惩罚威慑”,即印度军方需要进入中国领土或瞄准中国在公海的资产,进行惩罚威慑。^⑥

(三) 与美国互动

受中美和中印关系恶化与印美关系显著提升的客观现实影响,近年来美国直接参与和干预中印边界争端的意愿上升,与美国的互动成为中印复合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有以下两点:第一,以美国为主的第三国加紧利诱、拉拢印度,在边界问题上为印度的挑衅行为提供物质支持并制造声势。美国相继通过驻印度大使增加对中印边界敏感区域“前线探访”活动。2016年10月,美国驻印度大使维马尔访问中印边界的达旺地区。2018年10月,在中印实控线局势恢复正常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批外国

^①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Im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 July 2020. <https://thekootneeti.in/2020/07/15/china-pakistan-economic-corridor-implications-and-challenges/>

^② 杨思灵、徐理群:《印度地区安全知觉中的中国意象——基于2002~2003年度至2018~2019年度印度国防报告的分析》,《南亚研究》,2020年第1期,第39~42页。

^③ David Scott, “Sino-Indian Security Predicament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sian Security*, Vol. 4, No. 3, 2008, p. 257.

^④ Manoj Joshi, “The Unending Quest to Reform India’s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RSIS, March 2014. https://www.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4/09/PR140301_The_Unending_Quest_to_Reform_India_National_Security_System.pdf

^⑤ 刘红良:《论印度对华政策的对冲刚性与合作韧性》,《南亚研究》,2019年第1期,第1~15页。

^⑥ Yogesh Joshi and Anit Mukherjee, “From Denial to Punishment: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Changes in India’s Military Strategy towards China,” *Asian Security*, Vol. 15, No. 1, 2019, pp. 25-43; 谢超:《从洞朗到拉达克:印度对华威慑战略为何失败》,第41~43页。

军官进入班公措、列城等敏感地区。

美国还通过深化和扩大与印度的军事合作支持印方部署边防军力。比如，2016年8月，美国与印度签署的《后勤交流协议备忘录》(LEMOA)，以此保证美印两国从对方国家的海、陆、空基地获取补给、零件及维护等服务；2018年9月，双方又首次举行“2+2”（防长和外长）高级别会谈，并签署《通讯兼容与安全协议》(COMCASA)，该协议有助于印度从美国获取更加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提升印度边防部队的军事打击能力。2020年10月，印美签署《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帮助两国共享军事基地、通信系统和情报。^①此外，印度还积极从美国购买主要国防装备，包括重型运输机和反潜巡逻机，以扩大其对中国在印度洋和喜马拉雅山的监测覆盖范围，对于印度的侦察和情报获取能力起到极大的提升作用。而且，美国国内反华派官员长期在媒体发表评论，罔顾事实，歪曲中国捍卫领土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正当行为，鼓动印美在军事合作领域的同盟化。这些显然助长了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冒险心态和挑衅行为。

第二，中美印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战略三角”。稳定意味着中美印三国不追求绝对的联盟和制衡原则。一方面，当中印关系恶化时，美印在安全战略层面的持续紧密合作，会增加印度国内“亲美派”对莫迪政府政策的影响作用，推动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比如印度战略家拉贾·莫汉 (C. Raja Mohan) 认为，美国是印度成为世界大国路途上最大的外部助力，印度向美战略趋近是印度的根本利益使然。^②另一方面，印度具有高度的战略自主意识和能力，仍然需要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平衡。当印度未能从美国获取预期回报时，对美国的战略疑虑将会增加，相应会改变对华的强硬态度。比如，2018年尽管美印在军事领域合作深化，但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以及印度的反制措施使得两国经贸领域摩擦不断。尤其是莫迪上任后就提出了“印度制造”计划，希望将制造业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目前的15%提升至25%，这与特朗普政府希望制造业回

① 吴敏文：《美印是否已结成军事联盟》，载《中国青年报》，2020年10月9日。

② “The Quad’s Importance to India’s Strategic Autonomy,” March 16, 2021, <https://www.civildaily.com/news/the-quads-importance-to-indias-strategic-autonomy/>; “Why Does the Deepening Indo-US Friendship Puzzle so Many?” March 9, 2021,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quad-group-india-us-relations-joe-biden-7219965/>

流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结构矛盾。^①相反,印度则明显倾向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2018年,两国领导人通过武汉非正式会晤、上合组织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G20峰会等一系列会晤增进了战略互信,并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2018年8月,中国防长应邀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2018年中印关系企稳向好,这一年也被誉为是双边关系从“军事对抗的边缘到温和”的转折点。^②

综上所述,由于在复合竞争中,中印边界争端的相对稳定性因复合竞争因素的影响而遭遇“破坏”,使得印度产生“崛起焦虑”,即将中国崛起作为印度的参照项。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导致南亚次大陆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结构性变化,印度固守的地缘政治思维和对南亚霸权国的情结遭受严重冲击,表现出强烈的挫败感和不安全感。中国的崛起也因此被印度视为最大的安全挑战之一,印度对中国表现出强烈的战略疑虑和本体性不安全认知加深,甚至憎恶“他者”。印度的安全诉求需要通过增加威慑力度来满足,即在边界问题上持续强化其进攻姿态,推动危机升级并开始新一轮对抗。^③在加勒万河谷事件发生前,印度围绕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与中国强硬对峙,并期待自身的对抗行动对中国形成牵制,期待在心理上获取赢者的满足。然而事与愿违,加勒万河谷事件导致印度产生更大程度的“受害者心态”,夸大所谓的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威胁”和“进攻意图”,单方面持续加紧向实际控制线地区增兵,维持了两军接触态势。

结 论

本文主要从重复博弈和复合竞争的两个视角出发,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印边界争端频发性态势的理论框架。研究表明,中印边界争端的整个过程符合一种重复博弈模型。在一次博弈中,由于双方在涉及界定利益、讨价还价、国内舆论压力、信息沟通不对称等环节造成中印双方的边界战争。

^① 李恒阳:《美印关系的回顾与展望》,载吴白乙编:《2018年美国蓝皮书:美国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70页。

^② 《2018,中印关系企稳向好》,人民网,2018年12月31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1231/c1002-30497174.html>

^③ Jennifer Mitzen,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2, No. 3, 2006, p. 342.

重复博弈、复合竞争与中印边界的互动态势

在此之后，两国基于长期利益导向与“一报还一报”的理性策略，边界争端烈度持续降低，符合重复博弈中的合作博弈状态。然而，2020年6月15日加勒万河谷事件后，中印边界对峙态势的实践表明，边界问题的基本稳定存在诸多外部因素影响和阻挠。本文认为复合竞争理论可以帮助弥补重复博弈对中印边界互动状态的有限解释，在当前受地位竞争、地缘空间竞争和与美国互动的复合竞争影响，印度产生的本体性不安全促使其在边界问题上采取更加冒险的行为，导致加勒万河谷事件后双方脱离接触具有一定难度。重复博弈和复合竞争构建的理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为阐明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与现实因素提供了启发。

从根本上来看，争端的推动因素就是印度对中国存在严重的军事误判，误判增加了印度决策的非理性程度，增加了危机管控的难度。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是基于印度误判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而此次加勒万河谷冲突，印度则不仅误判了中国的战略决心和能力，更倾向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以及中国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为印度“前进政策”提供了机会窗口，使印度在边界问题上迷失了自身的“利益界限”，寻求通过逐步蚕食中国领土来获取战略主动性。同时，莫迪政府推行现实主义外交原则，这助长了其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而且，印度还加强边界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边界部队部署，提升应对中国的军事能力，加大空中侦察与情报收集能力等，增加了对中方的惩罚性威慑态势。

中印建交70年来双边关系中合作与共赢因素。例如，两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上的共识、反对国际及地区经贸领域中贸易保护主义的共同愿望、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双边关系和地区安全的总体稳定等。然而，边界问题作为长期存在又难以解决的复杂性因素，导致双边关系处于“好也好不到哪儿去”的困局中。正如中国学者所言，在相互不信任、领土问题难解的情况下，双方的第一要务应该专注于妥善管控边境，积极维持和平与安宁的现状。^①因此，有效、切实与可行的边界危机管控机制才是解决目前中印边界持续对峙问题的“良药”。然而，理性管控边界争端，促成双方工具性合作建设，需要建立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之上。

(编辑 毛悦)

^① 叶海林：《自我认知、关系认知与策略互动——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博弈分析》，第20～23页。

remains limited in general. Finally, the article provides insights from cognitive psychology that can help manage differences between states.

KEY WORDS: Modi Administration; India's China Policy Agenda; Anchoring Effect; Strategic Autonomy; Cognitive Limitation

Repeated Games, Complex Competition and Dynamics on the Sino-India Border

By Cao Pengpeng & Feng Huaixin

ABSTRACT: The Sino-India border conflict i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simple competing territorial claims, and instead is rooted in a complex set of realistic factor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repeated games, border conflicts tend over the long-term towards predictable and stable cooperation as rational players understand the implications of following a retaliatory strategy of tit-for-tat. The theory of repeated games roughly explains the basic logic that India and China followed in gradually de-escalating the border conflict following the 1962 border war. While so, in recent years the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of conflict in the China-India border region has increased, especially since 2020 when a violent conflict broke out in the Galwan Valley, leading to an ongoing standoff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is study finds that because of complex competition around the respective status of India and China, and related to their geo-strategic space, as well as due to dynamics vis-à-vis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has started to experience a form of ontological insecurity. If India wants to overcome its current passive position vis-à-vis the border standoff, it needs to enhance its deterrence vis-à-vis China.

KEY WORDS: Repeated Games; Border Conflict; Complex Competition; Ontological Insecurity; China-India Borde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ications of Joint U. S. -India Military Exercis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y Yu Xiang & Wang Do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U. S. -India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represent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outcomes of U. S. -India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The evolution of the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can be split into three respective phases: First was a pilot phase follow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at aimed to expand U. S. -India cooperation; Second was a phas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ment of a system of multi-dimensional and routine joint exercises at many levels between multiple branches of the U. S. and Indian armed forces following the September 11 attacks; third is the period of strategic coordination vis-à-vis China that has emerged since 2014, and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a form